

清末的改良与革命

——从戊戌后思想启蒙看有志之士的觉悟与抉择

汤仁泽

【摘要】戊戌政变后，思想界发生急剧变化。改良之路行不通，仁人志士苦思焦虑地探索，寻找新的出路，尝试各种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每次失败教训，是一次震动，也是一次转变思想和奋斗目标的契机。评价历史，不能以“成败论英雄”，而应作全面考虑。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他却起了思想启蒙作用，京师大学堂还是成立，各地中小学也相继建立；自立军虽然失败了，它却对革命、改良的划清界线起了作用。

【关键词】自立军；苏报案；留学生；革命

清朝末年，社会急剧变化，思想空前活跃，各种社会思潮起伏激荡，有革新与复古，也有改良与革命。戊戌变法和自立军起义，促使了仁人志士思想觉醒。他们痛感民族危机，甚至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为了振兴祖国，苦思冥想，尝试各种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碰到无数次的艰难险阻，经历无数次的挫折失败，使他们吸取教训，寻求新的出路。

一

轰轰烈烈的戊戌维新运动 100 多日便夭折了。1898 年 9 月 21 日，慈禧太后再次“训政”，下谕：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着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着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治罪”。梁启超于 9 月 25 日由塘沽乘轮船逃亡日本，康有为由京逃沪转港，也于 10 月 25 日抵达日本。康有为曾电告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上废国危，奉密招求救，敬请贵国若见容，望电复，并赐保护”。^①在日期间，康有为刊布“密诏”，发表《奉诏求救文》：

有为过承知遇，毗赞维新，屡奉温室之言，密受衣带之诏，艰难万死，阴相于天，奔走四方，精诚贯日，彷徨宇域，涕泣陈词，未能输张柬之之孤忠，惟有效申包胥之痛哭。普天洒血，遍地飞霜，皇天后土，哀忠臣义士之心；圣祖神宗，佑子孙神明之胃。

^②

并呼吁“凡大地数十友邦，吊吾丧乱；我中国四兆民庶，各竭忠贞”，“舍身于万死一生，冀救圣主”，与梁启超共同策划“勤王求救”，企图从慈禧太后手中夺取政权，重新扶助光绪皇帝复辟。

此时，孙中山、陈少白也在日本，“同属逋客，特亲往慰问”，欲与康、梁商议合作，但“康得清帝之眷顾，以帝师自居，目革命党为大逆不道，深恐为所牵累，是为两党日后轧轹之最大之原因”。^③

次年 3 月 18 日，横滨大同学校正式开学，创设大同志学会，“将以尊其所闻，学其所志，集环宇之知识，拯宗国之危殆”。^④又设想在神户开办学校，“教育清国人养才造贤，以谋改革清国宿弊”，认为“今清国人在日本者，虽不过数千人，合散在北美、南洋及欧洲各国而算之，大约有六百万人，皆从事诸商工业，广东人居其十分之七，若有大才贤智教导之，以改革我清国非难也”。^⑤康、梁等人在流亡期间的主要活动是组织保皇会，创办报刊，以期“勤

^①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光绪二十四年政变，光绪帝及西太后ノ崩御，袁世凯ノ免官》机密十八号，编号 500057。

^② 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0 年 10 月版，第 60—61 页。

^③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 6 章《革命保皇两党之冲突》，革命史编辑社，1928 年 11 月版，第 65 页。

^④ 梁启超：《中国志学会序》，《清议报》第 13 册《各埠近事》栏，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出版，见中国近代期刊汇刊《清议报》，中华书局 1991 年 9 月版，第 786 页。

^⑤ 《神户清人将开大同学校》，《清议报》第 19 册《万国近事》栏，光绪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出版，见中国近代期刊汇刊《清议报》，第 1213 页。

王”、“保皇”、“谋改革”。

义和团运动爆发，康、梁认为这是反击慈禧、荣禄的大好时机，“顷者拳匪作乱，杀害各国人民，困及公使，祸酷无道，闻之愤怒，令人发指，此皆由西太后、端王、庆王、荣禄、刚毅通联拳匪之所为也。其所以结通拳匪，出此下策者，为废弑皇上，绝其根株起也”。^①康有为在《致各埠保皇会公函》中称：“我南方勤王义勇已分布数路，不日将起，既成方面，可与外国订约，行西律西法，一面分兵北上勤王，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②

此时，自立军起义也在酝酿。在国内的实际活动者是唐才常。唐曾在湖南编辑《湘学报》、《湘报》，积极主张变法维新，与在时务学堂讲学的梁启超友善。戊戌政变前，应谭嗣同电召，欲赴京参与新政，不料政变猝起，遂出逃日本。在东京闻谭嗣同等六君子遇难，“痛极，欲航海复仇，不果”。在与康、梁保持联系的同时，唐又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接触，研讨救国方略。回国后在上海组织正气会，作为策动起事机关，“假东文译社之名，实以革命主义号召人心，结合有志之士。读其序文，有‘上切不共戴天之恨，下存何以为家之思’，及‘国与大地，必有与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云云，与彼日以保皇党友相标榜者，不啻背道而驰。君既蕴奇气于胸中，而光铄自不可掩，海内外之有志者，闻风而起，相率来归，革命之光线，遂充满于寓居黯澹之中矣”。^③他与保皇党人“背道而驰”，在汉口英租界设立自立军秘密机关，运动沿江各省会党和清朝防军，组织自立军。

1900年在上海愚园召开“国会”，唐自任总干事，宣布主要宗旨有“决定不认满清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又有“请光绪皇帝复辟”，宗旨含糊不明。

他徘徊于革命和改良之间，既得到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支持，“由毕（永年）介绍谒中山，筹商长江各省闽粤合作事”，^④又摆脱不了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的束缚，“自立会之设也，有康有为、梁启超等通其气脉，有容闳等替其运动”，^⑤既有反满的意愿，又有勤王的话语。结果被湖广总督张之洞以“纠众为乱，罪不容诛，^⑥的罪名捕杀。当时保皇会在日本创办的《清议报》作出如下评论：“佛尘之死，惨矣怨矣，吁可哀已。然吾不哀佛尘之死，而窃哀我皇上复辟之机，与吾中国维新之运，将自此绝也”。^⑦唐才常就义于武昌，“会党之及于难者总在百人以上”，^⑧血的教训再一次唤醒人们，改良之路是行不通的。此后，一大批有志之士摆脱了改良，走向革命，如秦鼎彝、蔡锷、毕永年等。

秦鼎彝（力山）是长沙时务学堂学生，起义失败后赴新加坡，“访康有为、邱菽园计划再举，因而尽知汉局之蹊，罪在康之拥资自肥，以致贻误失事，遂对康宣布绝交，愤然再度日本”，^⑨与革命派交往，逐渐摆脱改良，投身革命。蔡锷也是时务学堂学生，戊戌政变，学堂关闭。次年夏秋间，赴日本留学。唐才常谋划自立军起义，时务学堂学生留日者11人，陆续回国参与起事。蔡锷在日本学习陆军，“求学有成就，遂未同行。旋亦变计，决定独自归沪，参与起义。唐以松坡在同学中年龄最小，不欲其担负艰巨，即备一函，嘱赴湘见黄君忠浩，面商机要”。黄忠浩当时在湖南训练新军，并奉令移鄂。黄对自立军起事有看法，认为斗争方法不对，会造成重大伤亡，太可惜。于是留蔡锷居家，从长计议。不日起义失败，蔡锷幸而得免。“黄君筹措川资，仍送松坡赴日留学，以境其志”。^⑩毕永年与唐才常同为丁酉拔贡，又与谭嗣同友善，三人共商推翻清政府大计。他“极热衷孙、唐合作、联党救国之

^① 康有为：《致濮兰德书》，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2月版，第424页。

^② 康有为：《致各埠保皇会公函》，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第414页。

^③ 胡石庵：《烈士唐才常事略》，见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岳麓书社1983年1月版，第203页。

^④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9章《正气会及自立军》，第65页。

^⑤ 田野橘次：《哥老会巨魁唐才常》，见《自立会史料集》，第215页。

^⑥ 《鄂中诛乱记》，见《自立会史料集》，第54页。

^⑦ 《义士唐才常传》，见《清议报全编》卷15，《第四集文苑上来稿汇存》，横滨新民社辑印，第73页。

^⑧ 张难先：《庚子汉口之役》，见《自立会史料集》，第31页。

^⑨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87—88页。

^⑩ 《自立会志士事迹志略》，见《自立会史料集》，第92页。

议，然因种种阻碍，不能实现”。^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不久，他参加了惠州三洲田起义。

又如夏思痛，湖南益阳人，名寿华，清诸生。唐才常谋划起义时，曾遣夏思痛返湘联合哥老会，与起义军相接应。鄂事败，夏思痛“说合胡祖荫乘间举事，胡勿应”。此后“思痛东渡日本谋进行。后参加广东黄花冈之役，又入滇佐蔡松坡起义”。^②

自立会初创时分文事、武事两组，文事以文人主之，武事以能通军事学者主之。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文事、武事组会员选择革命甚至献身者众多，现略举文事组会员如下：^③

陈犹龙，字桃痴，湖南桃源县人。曾任自立军左军统领。起义失败后，东渡日本。民元佐谭人凤，任粤汉铁路要职。

龚超，字敬夫，湖南湘乡县人。事败，逃往澳门避难。1902年，与洪全福、梁慕先、李纪堂等，谋在广州大举，以覆清政。事泄被捕，判禁锢20年。迄辛亥反正，始获开释。1915年袁世凯称帝，龚超反对帝制，奔走游说，不遗余力。

朱茂芸，字苓溪，湖南凤凰人。湖南时务学堂学生。1899年留学日本，次年回国，参与自立军事，与龚超同为自立军右军助理。起义失败，间道走粤，展转而至日本。1903年，为支那亡国纪念会发起人十人之一。

赵必振，亦名廷扬，字日生，湖南常德县人。曾任常德方面自立军指导任务。事败，出走澳门，转往日本。1911年入京，随熊希龄赴热河，任热河都统署秘书长、财政厅长等职。

陈锦涛，字澜生，广东人。庚子自立军之役，负责上海外交事务。陈锦涛对经济学造诣很深，为孙中山所器重，辛亥南京临时政府及以后北京政府时期，陈皆出任财政部长。

禹之谟，湖南湘乡人。庚子自立军起兵武汉，禹之谟由日本回国，到汉口唐寓，见清兵满屋，始知有变，借故脱身而去。中国同盟会谋在湘设立分会，黄兴特遣禹之谟主持其事，湘人趋向革命者日众，革命势力在湘日盛，禹之谟是出了大力的。

以上只是从现存资料中所见参加自立军起义而后抉择投身革命的几位主要人物，实际上人数当远不止此，可知自立军起义“固可断为勤王、革命之一大鸿沟也”。^④唐才常组织的自立会，以时务学堂学生、留日学生及国内青年学生居多。唐才常是梁启超任教时务学堂时的同事和挚友，自立会接受康、梁的指导和捐助，但受到孙中山的影响也不小，在改良与革命间徘徊。它联络会党，运动清军，声势颇大，遍及湖南、湖北、四川、江西、安徽、河南等省，最终还是失败，唐才常遭捕杀，“一时骈首就义者达十一人”。^⑤戊戌变法的失败，说明依靠皇帝进行改革的道路是行不通的；自立军起义的失败，进一步说明在革命形势逐渐高涨的情况下，必须在革命、保皇之间做出认真的抉择。血的教训，促进了有识之士的觉醒，不能再游移徘徊、因循不变了。

二

从改良到革命，章太炎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投身革命，也是从改良而“匡谬”的。

甲午战后，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刺激下，康有为上书变法，梁启超在上海主持《时务报》，要求改革现状。章太炎曾与梁启超共事，“因阅西报，知伦敦使馆有逮捕孙逸仙事，因问梁启超：‘孙逸仙何如人’？梁云：‘此人蓄志倾覆满洲政府’”。章氏“心甚壮之”。后来章太炎追忆：“丁酉入时务报馆，闻孙逸仙亦倡是说，（按指“逐满之志”。）窃幸吾道不孤，而尚不能不迷于对山之妄语。”^⑥（对山，指康有为。）

康、梁以变政获罪，清政府下“钩党令”，捕杀康党，查禁学会，“群情惶惶”，章太炎

^① 《自立会志士事迹志略》，见《自立会史料集》，第82页。

^② 唐才质：《自立会庚子革命记》，《自立会史料集》，第78页。

^③ 参见《自立会志士事迹志略》，见《自立会史料集》，第79—94页。

^④ 支那黄中黄：《沈荃》。

^⑤ 张篁溪：《自立会始末记》，见《自立会史料集》，第10页。

^⑥ 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卷2，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版，第39—40页。

避居台湾，再赴日本，曾住清议报馆，并在“作维新之喉舌”的《清议报》上发表诗文。

1899年5月20日，在《清议报》十五册上，章太炎发表《客帝论》谓：

自古以用异国之材为客卿，而今始有客帝。客帝者何也？曰：如蒙古^①之主中夏是也。^②
《客帝论》收入“原刻本”时，增加了内容，说道：

及夫陵夷积弱，处逃责之台，被窃鉢之言，大枋既失，势侔于家人，宁奉表以臣敌国，而犹岿然自谓尊于玄圣之裔，岂不悖哉！乃夫冥旅侵突而为君者，故迹梁远，以华夏为异类，锋刃所抵，类祸厥宗，而无所慰痛。扬州之屠，嘉定之屠，江阴之屠，金华之屠，陷肉也如黑鹫，窃室也如群麀。其他掇发窖藏，掘冢坏陵，而取其金鼎玉杯、银尊珠襦之宝以为储藏者，不可以簿籍计也。及统一天下，六官犹耦，防营犹设，明末马（士英）、阮（大铖）筑板矾城为西防。左良玉叹曰：“今西何所防，殆防我耳！”今之防范，则谁防乎？名不正，言不顺，二百年泄泄然而不改，异夫。托不加赋以为美名，而以胡骑之餽饷，刑敝府库，迄有狱讼，则汉民必不可以得直；迄有剧寇，汉臣贤劳而夷其难。创痍既起，又置其同族于善地，以乱其治，吾义士之谋攘逐者，亦宁有过职乎？逐加于满人，而地割于白人，以是为神州大诟。^③

《客帝论》中，以满洲贵族入主中国为“客帝”，指斥清初清军屠城的暴行，揭露清政府“宁奉表以臣敌国”的媚外丑态，认为“逐加于满人，而地割于白人，以是为神州大诟”。为了反抗列强侵略，挽救民族危机，他期望清政府能抵御外敌，文章说：

且夫今世，则又有圣明之客帝，椎胸咄臂，以悔二百五十年之过矣。彼疏其顽童，昵其地主，以百姓之不得职为己大耻，将登荐贤辅，变革故法，使卒越劲，使民果毅，使吏精廉强力，以御白人之侮，大东辛颛之胄，且将倚之以为安稳。若是，又可逐乎？……中夏（原刻本作“震旦”）虽坏败，宁无其人耶？其攘逐满洲也，在今日；其不攘逐满洲也，亦在今日。客帝诚圣明，则必取谟于陆贽，引咎降名，以方伯自处。^④

此时章太炎还没要求排满，而是希望光绪做一个“圣明之客帝”，能“悔二百五十年之过”，做到“登荐贤辅，变革故法，使卒越劲，使民果毅，使吏精廉强力”，并“以御白人之侮”。

八国联军进攻北京，镇压义和团，暴露了清政府卖国求荣的真面目，也粉碎了章太炎“圣明之客帝”的美梦。在其手校的《诂书》上，写下一条眉校，表明对原作《客帝论》的不满：

辛丑后二百四十年（按为1900年），章炳麟曰：余自戊、己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弃本崇教，其流使人相食。终寐而颺，著之以自劾录，当弃市。

不久，章太炎又作《客帝匡缪》，对过去的“饰苟且之心”进行匡正：

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章炳麟曰：余自戊、己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饰苟且之心，弃本崇教，其违于形势远矣。……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讎，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陪隶已矣。^⑤

八国联军的入侵和“辛丑条约”的签订，使章太炎认清了清政府投降的实质，原先写的《客帝论》，“违于形势远矣”。“尊清者”指康有为、梁启超，在“与尊清者游”的过程中，认识到依靠改良派，不可能“逐满”，也不可能抵御外侮。《客帝匡缪》强调“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讎，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陪隶已矣”。他不再相信康、梁的“妄语”，说“《诂书》中《客帝》诸篇，即吾往岁之覆辙也”，^⑥

1900年7月，唐才常邀集沪上“名流”在愚园召开“国会”，章太炎也参加了，他当场宣布脱社，剪辫与之决裂。自称是“因唐才常主张一面排满，一面勤王，既不承认满清政府，

^① 《诂书》原刻本改“蒙古”为“满洲”。

^② 章炳麟：《客帝论》，见汤志钧：《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版，第84页。

^③ 章炳麟：《客帝论》，见汤志钧：《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7—88页。

^④ 章炳麟：《客帝论》，见汤志钧：《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8页。

^⑤ 汤志钧：《章太炎政论选集》，第90页。

^⑥ 章太炎：《致陶亚魂柳人权书》，见章炳麟著、徐復注《诂书详注》，第20页。

又称拥护光绪皇帝，余甚非之。因宣布脱社，割辫与绝。”^①几天后，撰写《解辫发》：

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秋七月，余年三十三矣，是时满洲政府不道，戕虐朝士，横挑强邻，戮使略贾，四维交攻，愤东胡之无状，汉族之不得职，陨涕涔涔曰：余年已立，而犹被戎狄之服，不违咫尺，弗能剪除，余之罪也。^②

已过了“而立之年”的章太炎，不能再留辫发，不能再“被戎狄之服”，表明反对“不道”的清政府的决心，高高树起反清革命的旗帜。

唐才常举事失败，康、梁依然坚持改良，保皇勤王。章太炎于1901年8月10日，在日本出版的《国民报》上刊登《正仇满论》，针对康、梁保皇主张，严词驳斥，指出满洲贵族统治的罪恶，不得不革命：

夫今之人人切齿于满洲，而思顺天以革命者，非仇视之谓也。屠剑之惨，焚掠之酷，钳束之功，聚斂之巧，往事已矣，其可以仇视者，亦姑一切置之。而就观今日之满人，则固制汉不足，亡汉有余，载其些微，无一事不足以丧吾大陆。……然则所谓溺职者，与所谓杀人行劫者，其今之满人非耶？虽无入关以来屠剑、焚掠、钳束、聚斂之事，而革命固不得不行，奈何徒以仇视之见狭小汉人乎？^③

接着，又指出梁启超的所谓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实是害怕革命，反对革命：“梁子所悲痛者，革命耳；所悲痛于革命，而思以建立宪法易之者，为其圣明之主耳”。

1902年春，章太炎提议“欲鼓吹种族革命，非先振起世人之历史观念不可”，倡议于4月26日在东京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宣传革命思想。还亲自起草《大会宣言》，号召爱国青年“血涕来会，以志亡国。”^④“留学生报名赴会者数百人”，是日，“孙总理亦自横滨带领华侨十余人来会”。^⑤纪念会的影响极大，扩大了革命思想的传播。不久，《江苏》、《浙江潮》等革命书刊也先后在日本发行了。

三

革命、改良的明确分家，相互论战，1903年的“苏报案”，是一个重要环节。

1903年5月13日，《苏报》发表《敬告守旧诸君子》，树起革命救国的旗号。文中指出：“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无他术。非革命不足以破坏，非破坏不足以建设，故革命实救中国之不二法门也。……吾非敢强诸君以革命也，诸君既为四万万分之一分子，则不可不革命”。还引用英人克林威尔所言：“非以血洗血，则不能改造社会”。强调革命必须流血，革命者愿为救四万万同胞而流血牺牲。5月27日（五月初一日），《苏报》改请章士钊为主笔。6月1日（五月初六日），《苏报》刊登“本馆特白”，题为《本报大改良》，说是：

本报发行之趣意，谅为阅者诸公所谬许。今后特于发论精当、时议绝要之处，

夹印二号字样，以发明本报之特色，而冀速感阅者之神经。^⑥

“大改良”从这天开始，至7月7日《苏报》被封，仅仅37天，而“来稿”、“论说”天天有，“排满”、“革命”之词处处见。

章士钊上任第一天，将《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一文交与陈范，陈“一见大骇”，说：“本报不得作如斯猖獗状，自取覆亡。”用了一天时间思虑，最终表示赞同，对章说：“本报恣君为之，无所顾藉”。此后，革命言论在《苏报》上“一切尽情挥洒，以迄于亡。”^⑦后该文在6月7日和8日连载。6月1日还发表“论说”《康有为》，借“政府召逋臣康有为返国

^① 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记》，《制言》第25期。

^② 章太炎：《解辫发》，见汤志钧：《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版，第148—149页。

^③ 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卷2，第120页。

^④ 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卷2，第135页。

^⑤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59、60页。

^⑥ 用加粗的二号样黑体字，为原《苏报》上所加大加粗的二号字，下同。

^⑦ 章士钊：《〈苏报〉案始末记叙》，丛刊本《辛亥革命》（1），第388页。

之一说传闻”加以发挥，指出：“戊戌之保皇不能行于庚子之勤王，庚子之勤王不能行于今后之革命。革命之宣告殆已为全国之所公认，如铁案之不可移。”还说：“天下大势之所趋，其必经过一躺之革命，殆为中国前途万无可逃之例。”6月4日（五月初九日）“论说”《论报界》中尖锐指出：“今日又报界黑暗、官场焚戾之时代”。《苏报》决心冲破黑暗，“吾将大索天下之所谓健将者，相与鏖战公敌，以放一线光明于昏天黑地之中”。6月7日、8日连载章士钊的《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文中责问清政府：“今日公等之所为贪戾狠毒、横敛暴征，何在非酿成革命之药料？公等自备此药料，日施此药料，而乃归咎于此米之不应化为酒也是何说也？公等之欲严拿留学生，也是则实施此药料之手段也”。明确指出清政府卖国求荣、贪戾狠毒、横敛暴征，是“自革其命”。

《苏报》“放言革命”的同时，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书》先后问世。《苏报》除刊载外，还尽力报导、介绍，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也最大。

1903年春，邹容与章太炎在“爱国学社”相识，邹容正著《革命军》，“书成，就太炎求修饰，太炎曰：‘语虽浅直，然感动普通社会，非如是不可’，遂为作序，议广其传。”^①

6月9日（五月十四日）《苏报》刊载署名“爱读《革命军》者”所写的《读〈革命军〉》一文，谓：“是以排满之见，实足为革命之潜势力，而今日革命者所必不能不经之一途也”。并热情颂赞：“卓哉！邹氏之《革命军》也，以国民主义为干，以仇满为用，捋撻往事，根极公理，驱以犀利之笔，达以浅直之词。虽顽懦之夫，目睹其字，耳闻其语，则罔不面赤耳热，心跳肺张，作拔剑砍地、奋身入海之状。呜呼！此诚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也”。

同日“新书介绍”栏刊《革命军》广告，全文为：

《革命军》凡七章，首绪论，次革命之原因，次革命之教育，次革命必剖清人种，次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次革命独立之大义，次结论。约二万言。章炳麟为之序。其宗旨专在驱除满族，光复中国。笔极犀利，文极沉痛，稍有种族思想者，读之当无不拔箭起舞，发冲肩竖。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是所望于读《革命军》者。

第二天，发表章太炎的《序革命军》，将其比作震撼人心的“雷霆之声”，称为“义师先声”。章在《序》中还“大言革命”：

夫中国吞噬于逆胡，已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诈暴之工，人人所身受，当无不昌言革命。

抑吾闻之，同族相代，谓之革命；异族攘窃，谓之灭亡；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除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容之署斯名，何哉？谅以其所规画，不驱除异族而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犹有当革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

序末署“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四月”。

6月20日（五月二十五日），“新书介绍”栏中介绍《驳康有为书》，说是：“康有为《最近政见书》力主立宪，议论荒谬，余杭章炳麟移书驳之，持矛刺盾，义正词严，非特康氏无可置辨，亦足以破满人之胆矣。凡我汉种，允宜家置一编，以作警钟棒喝。定价一角”。

1902年春，康有为发出《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和《与同学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两封公开信，书中提出革命不适合于中国国情，说什么：“统计欧洲十六国，除法国一国为大革命，实与俄之一国为专制者同，皆欧洲特别之情。”^②还说什么：“法国之地与民，不得中国什分之一，而革命一倡，乱八十年。第一次乱，巴黎城死者百廿九万。中国什倍其地，什倍其民，万倍于巴黎，而又语言不通，山川隔绝，以二十余省之大，二百余府之多，二千余县之众，必不能合一矣。若有大乱，以法乱之

^① 冯自由：《〈革命军〉作者邹容》，见《革命逸史》（2），中华书局1981年6月版，第47页。

^② 汤志钧：《章太炎政论选集》（上），第210页。

例推之，必将数百年而后定，否亦须过百年而后定。”^①

这两封公开信，被合印为《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在华侨中大量散发，广为宣传。为了击退保皇派，章太炎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批驳康有为的谬论。该书经《苏报》节录，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刊登在6月29日（闰五月初五日）的《苏报》上。章太炎用词激烈，敢于向神圣不可侵犯的君权挑战，直斥保皇派所尊崇的“圣主”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歌颂民主革命“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

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介绍和刊发，一纸风行，振聋发聩。同时，也引起了清朝统治者的极大仇恨和震惊。6月下旬，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制造了“苏报案”。

《苏报》宣传排满、鼓吹革命，引起清政府的震惊，而《苏报》馆位于租界，无法直接下手镇压。江苏巡抚恩寿多次指示上海道台袁树勋与租界交涉，抓拿革命党人。6月29日（闰五月初五日），清政府与上海租界当局勾结，准备拘捕《苏报》有关人员，妄图利用镇压来“防微杜渐，杀一儆百”，打击和铲除革命派的活动。报馆先有风闻，有人提前出走躲避。章太炎从容就捕，邹容不愿置身在外，自行投案。

《苏报》虽在中外反动派的勾结和打击下遭封禁，但它却震动朝野，影响深远。《苏报》被查封后仅一个月，章士钊等就在上海创办《国民日报》，宗旨与《苏报》相同，继续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此后，“革命思潮益风起云涌，长江沿岸各省之志士及已解散之爱国公学学生，仍多散放宣传小册及日本出版之各种书报，为《苏报》之代。”^②更多的爱国知识分子阅读《革命军》等革命书刊，走上反清斗争的革命道路。

“苏报案”的发生，促使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革命团体的组成，光复会、华兴会先后成立，并与兴中会合组为同盟会，并创设了《民报》，除组织多次武装起义外，在《民报》上宣传“排满”、“反清”。革命已成为时代的主流，改良派的市场也就日益消失了。

四

从清末间改良、革命的历史过程中，可以看到发生、发展的趋向，也可以看到革命终将代替改良，成为时代的主流。但不能由此将“改良”全面否定。革命成为时代的主流，是在和改良的斗争中，逐渐完善和不断提高的。即就戊戌维新而言，它对近代教育就有着重要贡献。科举制度的改变和京师大学堂的成立，就是一例。

戊戌新政时期，康有为代徐致靖拟《请废八股以育人才折》，要“易风气而救危局”，“伏望皇上上法圣祖，特旨明谕天下，罢废八股，自岁科试以至乡会试及各项考试，一律改用策论，以发明圣道，讲求时务，则天下数百万童生、数十万生员、万数举人，皆改而致力于先圣之义理，以考究古今中外之敌，务为有用之学，风气大开，真才自奋”，并强调“新政之最要而成效最速者，莫过于此”。^③接着，清政府颁布废八股为策论、广办学堂等上谕，特别是8月18日命各省挑选学生赴日留学：

军机大臣等：电寄各省督抚，日本政府允将该国大学堂、中学堂章程，酌行变通，俾中国学生易于附学，一切从优相待，以期造就。着各省督抚，就学堂中挑选聪颖学生，有志上进，略谙东文、英文者，酌定人数，克日电咨总署核办。^④

清政府在甲午战后，终于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苏醒过来，渐知排外守旧主义之非。日本

^① 汤志钧：《章太炎政论选集》（上），第215页。

^② 冯自由：《上海〈国民日报〉与〈警钟报〉》，见《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6月版，第135页。

^③ 康有为：《请废八股以育人才折》，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第285—286页。。

^④ 汤志钧、陈祖恩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57页。

文部省专门学务局长兼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上田万年在《关于清朝留学生》一文中说：

中国这个衰老帝国，过去昏昏欲睡，奄奄一息，自从甲午一役以来，益为世界列强欺凌所苦，如今觉醒过来，渐知排外守旧主义之非，朝野上下，奋发图强，广设学校，大办报纸杂志，改革制度，登用人材，欲以此早日完成中兴大业。今日清朝派遣留学生来我国，最先虽或因我国公使领事劝诱所致，然实亦气运所使然。……清朝于四五年前，仍对我轻侮厌恶，今一朝反省，则对我敬礼有加，且以其人材委托我国教育，我国应加何觉悟反省一己之重任？^①

留学的大门敞开，掀起了赴日留学的热潮。青年学子思想活跃，容易接受新思想、新观念，逐渐形成新知识阶层。在反清大旗指引下，培养出一批革命骨干，积聚起一支革命力量，最终推翻了清王朝。这一结果却是清政府未曾预料的。

最初，留学生人数不多。1896年“清朝首次遣派学生十三人抵达日本。……这一批学生都是经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选拔而获派留学日本的，年龄从18岁到32岁不等”。^②1899年10月，“嘉纳治五郎主持的私塾改为亦乐书院，收容十一名张之洞派遣的学生入学”。此时，梁启超等开办的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函招时务学堂旧生从学，秦鼎彝在该校“日读法儒福禄特尔、卢骚等学说，及法国大革命史，复结识孙总理、章炳麟、沈云翔、戡元丞诸人，渐心醉革命真理，种族观念油然而生”。^③东京高等大同学校“最初有学生18人，多数是流亡日本的人，包括蔡锷和范源廉”，^④1900年唐才常谋举自立军于汉口发难，“大同学校湘籍学生与唐有师生关系，闻命赴义者有林锡圭、秦力山、田邦璇、李炳寰、蔡钟浩等”，^⑤加上校外留日学生，“慷慨赴义者二十余人”。^⑥

1901年9月27日（八月初五日）清政府颁布谕旨：

造就人才，实系当今急务，前据江南、湖北、四川等省选派学生出洋肄业，著各省督抚一律仿照办理，务择心术端正、文理明通之士，遣往学习，将一切专门艺学，认真肄业，竭力讲求。学成领有凭照回华，即由该督抚学政，按其所学，分门考验。如果学有所成效，即行出具切实考语，咨送外务部复加考验，据实奏请奖励。其游学经费，著各直省妥筹发给，准其作正开销。如有自备旅资出洋游学者，著各该省督抚咨明该出使大臣随时照料。如果学成得有优等凭照回华，准照派出学生一体考验奖励，候旨分别赏给进士、举人各项出身，以备任用，而资鼓舞。将此通谕知之。^⑦

清政府奖励留学，令各省督抚选派学生出洋，还鼓励“自备旅资出洋游学者”，如学成归国，可以取得进士、举人等出身。奖励政策也促进了公费、自费留学生奔赴日本。

1905年废除了科举制度，新教育发展迅速，全国各地各级学堂大量涌现。除了进学堂，选择留学的学生也不少。留日学生人数激增，“1905年及1906年都约有八千人”。^⑧庞大的留学生队伍中，“除男子之外，也有步履维艰的缠足女子、老人和小孩。他们为接受由小学至大学程度的各种教育而来。……论学历，有的拥有进士、举人、秀才各种头衔”。^⑨广大青年学子积极东渡求学，在他国异乡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有历史背景及诸多个人因素，关键是由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给予热爱祖国的人们以强烈刺激，他们为国家的兴衰而奔赴革命。

^①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三联书店1983年8月版，第2页。

^②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第1页。

^③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85—86页。

^④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第27、28页。

^⑤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73页。

^⑥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81页。

^⑦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84年9月版，总4720页。

^⑧ 实藤惠秀在统计人数前说明：“我同意青柳笃恒在《中国留学生与列国》一文所说，‘据最近确实统计，文武男女学生共约八千人’”。见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第39页。

^⑨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第40页。

当 1894 年冬,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时,“兴中会在海外分会,除檀岛外,即以日本横滨为首屈一指。中山及陈少白、杨衢云于乙未失败后,常逗留横滨,假该处为第二活动之策源地”。^①1895 年 1 月,孙中山“为回国策划武装起义,由檀香山赴香港,经日本横滨时在船上对华侨宣传革命,结识商贩陈清,交付《兴中会章程》等文件,嘱与当地侨商照章设立分会”。^②自 1904 年前后,国内成立了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和光复会等革命团体,10 月至 11 月,由于长沙起义失败和万福华刺王之春案件的牵连,革命团体的部分领导人和骨干分子,相继逃避日本。1905 年 7 月 19 日孙中山再抵日本,参加 8 月 20 日在东京召开的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1910 年 2 月,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其时总理在北美,克强在南洋,东京本部无人主持,形势非常涣散。”^③6 月 10 日,孙中山由檀香山秘密抵达东京,召集黄兴、赵声等同盟会骨干举行会议,准备“在年内‘中止一切不成熟之举动,……今后数月可以和和平方式进行革命工作’,俟布思在美筹得巨款后,再行发动起义。”^④黄兴是 1902 年被湖广总督张之洞选派去日本留学的,“6 月抵东京,入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⑤光复会的领导人陶成章于 1902 年赴日本留学,入成城学校学习陆军,曾在日本参加军国民教育会。

章太炎:《龚未生事略》云:

癸卯春,以争俄约事,游学诸生相联为军国民教育会,则黄克强、杨笃生、纽惕生、陶焕卿(成章)、汤尔和皆在焉,余亦加入会中;而内地有外舅章太炎先生及蔡鹤卿、吴稚晖诸君,以复汉之帜相与倡和。……及苏报案作,上海同志散亡略尽,惟鹤卿以清静不竞,得留故国。焕卿潜与同志有约,为光复会。^⑥

陶成章说:

军国民教育会组织有暗杀团,规则极为严密,为上海中国教育会会长蔡元培所规知,求入其会,于是改名为光复会,又曰复古会。^⑦

1904 年 1 月,陶成章“与魏兰由东京而至上海,与蔡元培熟商进取之法”,并至浙江联络党,光复会成立,他“奔走最力”。

1905 年 8 月,以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基础,联络光复会成员在日本组成同盟会,其中很多骨干,曾经在日本留学,而这些学生中,又有很多是在清政府废除科举,官派出国留学的生员。清政府派员出国留学,是在科举制度废除后“造就”的人才,而这些留学生却有不少投身革命,这当然是始料所不及的。那么,在珍视“出国留学”人员的同时,也不能排除清政府废除科举后的变革。

基于上述,评价历史,不能以“成败论英雄”,而应作全面考虑。有的事件,即使失败了,既不能忘记志士的劳绩,也不能忘记他的社会影响和对以后的历史作用。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他却起了思想启蒙作用,京师大学堂还是成立,各地中小学也相继建立;自立军虽然失败了,它对革命、改良的划清界线起了作用。本文特以此立论,也只是说明历史是复杂的,研究历史贵在实事求是,取得正确的结论。

^①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 6 章《革命保皇两党之冲突》,第 41 页。

^②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 1980 年 7 月版,第 29 页。

^③ 居正:《辛亥札记》,见武汉大学历史系编:《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12 页。

^④ 《孙中山年谱》,第 109 页。

^⑤ 毛注青:《黄兴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10 月版,第 19 页。

^⑥ 章太炎:《龚未生事略》,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 785 页。

^⑦ 陶成章:《浙案纪略》第 2 章《党会原始》,见《陶成章集》,第 334 页。